

邓小平珍闻录

张世明、郑晓国、相三桂 著



知识出版社

K8277
114

85341

邓小平珍闻录

张世明 郑晓国 相三栓

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8 号

责任编辑 梁 源

封面设计 旺忘望

邓小平珍闻录

张世明、郑晓国、相三栓 编著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48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

ISBN7—5015—0917—4/K·57

定价:6.00元

邓小平珍闻录

邓氏家谱	(1)
风雨故园	(5)
得“蛋圈”以换取母亲煮鸡蛋的鼓励	(12)
✓爬到石乌龟上玩	(15)
✓“偷”钱义助同学	(17)
劝阻同窗好友割肝救母	(20)
✓油印博士	(23)
✓当衣服买票看足球	(28)
蒋经国的团小组长	(31)
主办“第二黄埔”	(34)
三找小香荣谈话	(38)
寻乌事件	(41)

卡尔逊眼中“思想象芥末一样辣”

的政治委员	(5 4)
刘邓之间难以放入“、”号	(5 9)
与李达关于吃油的争论	(6 4)
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	(6 9)
马夫·警卫员·秘书	(7 2)
请刘伯承为胖胖起名	(7 6)
不握手会议	(8 5)

临行前,邓小平在小本子上记下了陈毅

的电话号码.....	(8 8)
雨中还伞	(105)

毛泽东形象地评价邓小平是

“棉里藏针”	(112)
陶铸愿拜邓小平为师	(119)
作囚徒乘专机	(125)
邓小平小道	(134)
景德镇花瓶	(138)

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

突然再次出现	(144)
在布热津斯基家作客	(149)
喜滋滋戴上得克萨斯牛仔帽	(153)
在华盛顿接到毛泽东的来信	(159)
同卡特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163)
两次动怒	(170)
当陈树柏建议邓小平替共产党	
改个名字时.....	(175)
铁娘子人大大会堂前一失足成千古谈.....	
.....	(179)
错怪黄华引起轩然大波	(185)
钟士元等遭到邓小平的批评	(190)
游黄山路遇女大学生	(196)
与杨小燕打桥牌	(201)
击浪黄海	(207)
一次特殊的家庭会议	(212)
中国头号烟民	(220)
给“节日的厨师”卓琳敬酒	(223)

邓氏家谱

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独具的特色，谱牒即为其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致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基层结构是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血缘为本位、儒家思想为伦理规范的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结构，宗法血缘关系是把社会成员组织起来的天然纽带。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子孙繁衍，代代相传。为了不使先世显绩卓行恍惚不复记忆，许多宗族都赓续不断地修撰家谱。

文坛奇人梁启超曾自豪地宣称：“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毛泽东的家谱在一些较大的图书馆都有庋藏，且为许多这方面的学者加以慎密的研究。然而，邓小平的家谱却鲜为人知，人们更是无缘得见。

这是一本破旧的、普普通通的四川农民家庭中常见的家谱！然而，它却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那发黄的纸张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邓氏分谱叙》，由“醇公祖公题，曾孙绍明续记此”，现为邓小平的同祖堂弟邓先选独执续藏。全谱共四万二千余字，内容有朝数、世纪、明纪、清纪和寿文、祭文等。这本谱叙先这样写到：“我姓始于周之邓国，盛于汉之高密，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唐宋元明，代有伟人，所书之谱，则各执一本，各书其分派，各叙其来历，世世加添。”

这本谱叙披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邓氏先祖是从江西迁到

四川的。众所周知，人的社会流动，包括垂直的地位变迁和水平的居住地变迁，谱牒对此都往往言之历历，故而《邓氏分谱叙》便反映了邓小平先祖落籍四川的曲折历程。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明一世祖邓鹤轩，祖籍江西吉安府卢陵县，娶妣曾氏，明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卒葬邓家湾。除二、四世祖外，三、五、六、七世祖均为举人或进士。八世祖邓士廉曾任明朝的历官、史书尚书。九世祖为廪生。这九个世祖中的六、七、八世祖兄弟十五人，都是士大夫，分别出任明朝的户部郎中、监察御史、按察副使、府教授、兵马指挥使司等职。

降及清朝，一至九世祖，只有一世祖邓绳其公的第三代十个孙子中有六兄弟分别为清朝的副榜举人、翰林、大理寺正卿、增生、文生。自此而后，则立邓氏字辈为“以仁、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应、尔、昌、荣”，使这一家族的命名一应准此。

《邓氏分谱叙》又记载：“清纪，七世祖邓心泰字容安，长子克远、次子克丰；八世祖邓克丰字裕元，八十生辰寿文……堂侄绍昌顿首恭祝”。该谱文还说：“克丰字裕元，妣李氏所生六子，长绍瑄、次绍圣……民国九年与其侄小平先圣留法，至十五年旋入俄……”由此考证，邓心泰是邓小平的曾祖父，邓克远为邓绍昌之父，小平先圣之祖父。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远、祖母戴氏生独子绍昌。1927年，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母亲淡氏为祖母所立的墓碑上的铭文即可为佐证。其文曰：“故显妣邓母戴老太君之墓，男绍昌、媳淡氏，孙先圣、修、治、清”。此外，墓上还刻有一副对联，横额是“人杰地灵”，上联是“阴地不如心地”，下联是“后人须学好人”。

邓小平的祖父、祖母都是俭朴善良的农民。他们以种田、织布、推粉为业。当时，中国农民的最大愿望大都是买一块自己的土地，为后人留下一个安身的房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风里来雨里去，早起晚睡，对买田置产这个切切实实的目标孜孜以求。通过勤劳俭用，邓小平的祖父积攒下了一些钱粮，在前辈茅舍屋地基上

建造起一幢十六间的传统风格的 U 字形木结构瓦舍，——这是邓克远夫妇足以告慰乃祖乃父的宏伟业绩了！因为，在生产水平不甚发达的清末，在国事蜩螳的岁月里，能够如此大兴土木，决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邓氏家业之兴旺发达，于此可见一斑。如今，这些房舍虽然从外表来看似乎有些年久失修，但昔日的隆盛景象却不难想象。

到了邓小平的父亲时期，其家已成为一个相当殷实的农户，仍然开设一个小丝绸厂和制粉条场。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又名邓文明，由于出生在这样一个经济条件比较好而且又崇尚读书识字的家庭，所以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清末就学于成都政法学校，以后长期在外谋事。根据 1969 年海外出版的《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的记载，邓文明曾是哥老会的成员，并且充任这个组织的“旗手”职务。揆诸时势，当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国将不国，黎民百姓生计维艰，怨声载道，这样，哥老会等秘密结社如同星火燎原般比比皆是。四川尤其如此。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加入哥老会以求互济互卫，亦未尝不是避难趋福的权宜之计。

邓绍昌有四男三女，长子先圣（小平），学名邓希贤，乳名贤娃尔。1927 年，为了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邓小平才开始用“小平”这一化名，以致原名几乎湮没不闻而化名却后来尽人皆知。邓绍昌的次子邓先修原为湖北省省长，现任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三子邓先治生前曾任贵州省六枝市市长；四子邓先清现在四川省政府供职。邓绍昌的长女邓先烈，系家庭妇女，现在四川重庆安度晚年；次女邓先英，原在四川省委办公厅从事机要、档案工作，现在退休在家；三女邓先琼，原在天津工作，现在北京国防科工委任职。

邓小平的生母淡氏出生于四川广安县恒升乡有点小名气的“淡家牌坊”，并称得上较为富有的家庭。她是长女，从小受到中国传统重视家教的良好教育，贤惠勤劳。与邓小平的父亲结婚后，她娘家父母相继去世，使她悲恸万分。而令人更为伤心的是，弟弟淡

以兴弟兄以及其妻子四人均染上了吸食大烟的恶习，终日吞云吐雾，几乎将父辈辛辛苦苦挣来的遗产田地卖光吃光，倾家荡产，沦为贫穷的人家。由于邓小平父亲长期在外谋事，所以家里就由邓小平的祖母戴氏、母亲淡氏操持家业，抚育后人。邓小平的祖母戴氏、母亲淡氏严于家教，要求子孙学圣、修身、治家、清廉。

小平的舅父淡以兴回忆当年他和小平孩提生活时曾说：“幼年时，我和小平一起上学念书，我太笨，他很聪明，每回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因此，大家都选小平当学生代表，受到老师的表扬。但我姐夫和姐姐对小平要求甚严，向老师提出‘不要小平当代表，表扬多了就会骄傲’。”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邓小平的祖母戴氏辞世西归后，母亲淡氏亦不久跟着撒手人寰。邓小平的母亲淡氏与世长辞后，邓绍昌续娶了嘉陵江支流涪江船工的女儿夏伯根。与当时绝大部分的农村妇女一样，夏氏终身目不识丁，但她的心灵象嘉陵江水那样清澈洁净。也许，因为她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坚毅的嘉陵江船工的血液，所以她到邓家后便挑起了理家育子的重担，勤劳不辍。当时，邓小平正在外面从事革命工作，家里有邓小平的三个姊妹、一个亲戚和邓家的一个长工，全家的内政外交，全靠夏伯根独立操持。十多亩地的经营、几个女儿的上学、全家人的吃穿用度以及应付国民党的各种苛税和差事，使她终日忙之不懈。夏伯根对人宽厚和善，周围的人都很尊敬她，亲热地称她为“夏伯娘”。

风雨故园

1904年8月22日。

四川广安县姚坪里(今协兴乡牌坊村)一个旺族家里。

一个婴儿呱呱落地。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婴儿后来会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如此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可不是吗,伟大出自于平凡,此乃不刊之论。

这个婴儿就是——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

在邓小平来到这个世界时,大清帝国已是暮霭沉沉,行将入木。尽管帝国心脏北京紫禁城内鳞次栉比、互为一体的宫殿的复杂而又封闭的世界里,宫廷生活还在按照古老的礼仪进行,尽管清末新政搞得沸沸扬扬,但帝王统治正在穷奢极侈中毫无作为和绝望地度过它最后一段岁月。

人们常说:天下大乱而蜀先乱,天下大治而蜀后治。这是因为,蜀道艰难,四川盆地地形封闭,故而在参与全国经济的全面增长过程和社会发展运动中往往慢若干节拍,与此同时,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这片狭小的生存空间里容纳着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居民,稍有天灾人祸,脆弱的经济便会濒临危殆,酿成社会的震荡与紊乱。

正因为如此,当清朝统治黑暗无比、希望几绝之际,四川已处处显示出“天黑云低燕飞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兆头了。

广安,地处四川东南部,距重庆一百多公里。在广安城的协兴

乡牌坊村，有一座农村三合院。青瓦屋顶，黄色粉墙，木栏窗户，泥土地面，给人一种古朴之感。堂屋门前，悬挂着一个横匾：“邓小平同志旧居。”如果没有这个横匾，初次来到这里的人们决不会想到邓小平同志竟会诞生在这样一座普通的农舍院落里。按照常理，这横匾必定出于哪位名人的手笔，孰不知却是当地长五乡一位小学教师书写的。

据说，邓小平的祖先是前清翰林，当地人为褒其学绩功名，曾在村头立牌坊为记，牌坊村由此而得名。六十年代初期，一位副县长到牌坊村视察工作，他说：“牌坊村出了伟人，在中央工作，我看牌坊村应改叫伟人村。”就这样，牌坊村便改称为“伟人村”。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全国山河一片红，许多地方纷纷更改厂名、街名、店名，什么“东安商场”改为“东风市场”啦，什么“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北京的造反派来到广安，又“义愤填膺”地勒令将“伟人村”改为“反修村”，以示革命的激进。不仅如此，来自北京的“造反有理战斗团”还肆无忌惮地抄家、砸东西。他们对邓小平同志年近七旬的舅舅和舅母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批斗，抓头发、打耳光、挂牌子、罚站，一切能摧残人身的“革命暴力手段”都用上了。那些不可一世、唯我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口号震天，把牌坊村畴昔的宁静扫荡得干干净净，到处都呈现出粗野、疯狂、暴烈的气氛。

阴霾散尽，牌坊村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时光。1975年，人们已经由狂热的亢奋状态中冷静下来，对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开始感到疲倦、冷漠、麻木以致厌恶，这样，“反修村”才又复称为“牌坊村”。

沧海桑田。

峰回路转。

如今，邓小平故居一仍其旧，四周的竹子郁郁葱葱，一块块明镜似的水田、一畦畦嫩黄的油菜花，使人赏心悦目。几十年前，邓小

平辞别了他的父亲，同时也离开了抚育他成长的继母、他的姐姐和两个弟弟。五十年代初期，邓小平担任西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他的继母便搬到重庆和他们同住，邓家的房子就给了村政府。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复出后，四川省政府和广安县政府曾有意在此筹建纪念馆。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他说：“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故而，邓家的房舍归村里所有，由大约9家住户占去11个房间（邓小平离家后这里可能又增添了一些房子）。当地人将邓小平的旧居拨出老房三间供来访者参观。在正房内陈列有数十幅邓小平会见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官方照片，包括尼克松和卡特两位总统。另一个房间放着一张清代木床，据说这床曾经是邓小平家的。第三个房间陈列着中国最高领导人赞扬雷锋的题词。此外，这三间房屋里还摆着一些邓小平年少时用过的桌、椅、凳、柜之类，极其简单。

一位美国作家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说：“总之，作为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在他的领导下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改善了生活，他的功绩可与毛泽东相比拟，而在他的旧居纪念地，其陈设未免过于简陋了。”

是啊，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世所公认，有口皆碑，完全可以和毛泽东相媲美而言，但他决不搞“个人崇拜”，在这一点上他和毛泽东很不一样。人们也许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被老百姓奉若神明，毛泽东的故居韶山冲这一“龙兴之地”被视作圣地。仅在文化大革命发起的第一年，就约有三百万人去韶山冲“朝圣”。前来参观韶山的人们晓行夜宿，络绎不绝，把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作为纪念品带回去，以示对毛主席的忠诚。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的家就显得逊色多了。在这个600户的村落中没有任何政治崇拜的标志。

——县里的一位干部说：“邓小平不允许在他的旧居建立纪念馆等一类使人看上去又回到‘个人崇拜’老路的东西。”

——一个学生花了几个小时乘坐奔驰在崎岖不平、尘土飞扬

的公路上的汽车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地方，连一点纪念物品也找不到，可能甚感失望。他在邓小平旧居来宾留言簿上这样写道：“谁能看出这里降生过一位伟大人物？”

1984 年有 1.4 万人来这里参观，1985 年参观人数超过两万。大多数参观者乘坐公共汽车，但据当地官员说，甘肃有两位农民步行 1000 多英里来这里看一下这座房子，也有人骑自行车行程数百英里到这里来，表达他们的敬意。来宾留言簿内可以说明参观者的这些情感。

“邓小平同志是我们的楷模，愿他健康长寿。”几个月前来自重庆的一位铁路工人这样写道。一位农民写得很简单：“邓小平是当代一位最杰出的人物。”

关于是否对邓的家庭情况有意作些遮掩的问题，当地官员们说村里缺少有关邓家的记载，现在的村民也不大知道邓家的事情——尽管邓小平的继母离开村子仅三、四十年，邓小平最小的弟弟曾于 60 年代初期回过原籍一次。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封建社会司空见惯的事情。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们往往通过对与自己有关的人大吹大擂而求得心理满足的自发倾向。显然，广安县的公民为他们有着这么一位乡亲而感到自豪，但他们决不为此而洋洋自得。在邓小平家乡，老者对邓小平直呼“小平”，少者则称他为“邓伯伯”。唯有牌坊村邓氏本家有殊异，但也未跳出按字辈称呼的传统。邓小平的族弟邓先知对采访者说，邓小平的学名叫邓先圣，是 본家“先”字辈兄弟中年龄最长者，所以大家都称他“老哥子”；“先”字辈下面是“型”字辈，“型”字辈称他为“老辈子”；再低一辈的是“培”字辈，则称他为“公公”。家乡父老兄弟对邓小平的这番称呼，可谓数十年一贯制，即使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倒霉的时候，也未曾改变。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位当红卫兵的年轻人到四川广安串联，当

时正值邓小平失势，但一些乡中父老对这位年轻人提起邓小平时，都竖起大姆指头，啧啧称赞说：“小邓是刑部尚书之后，今日由他执掌国法，行……”亲近之情，溢于言表。

这是多么淳朴的乡音啊！又是多么可贵的亲情啊！

原来，邓小平的先祖邓时敏曾任过清朝乾隆年间的大理正卿，故而乡亲们有如是之说。相传，邓小平六个月大时，生母淡氏拿两样东西逗引小平，一样是一枝鲜丽的玫瑰，一样是一个小锤子。小锤子是邓家先祖、当刑部尚书的太太祖邓时敏的遗物。通常娃娃都是爱靓的，定会伸手接那枝玫瑰花，但小平这娃娃却伸出胖手，一把攫住了那柄小锤子。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显乐了，笑着说：“格老子！你可是个法王爷的种子！”

中国农民“辨别”政治风向的能力不强，他们只是凭借能否使自己富裕起来的直观感受来评价一个政治家。文化大革命当中，工作组要召开批判大会，老百姓是“头遍钟不见面，二遍钟伸头看，三遍钟才来会场转一转”。在那个年月里，老百姓天天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精神去开批判大会。等到农民们稀稀拉拉地到得差不多了，主持会议的人宣布：“现在正式开会。”闹哄哄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了，庄稼汉们叭嗒叭嗒抽着水烟，婆娘们趁机开始纳鞋底。主持会议的人倒是情绪激昂，说得唾沫横飞，要求“贫下中农起来揭发，起来控诉”，可是台下的人却毫无动静。长时间的冷场，终于一位八十多岁没有文化的老大娘，颤颤巍巍地拄杖上台，张开那几乎已经没有牙齿的嘴巴，断断续续地说：

“邓小平……搞资本主义……不在行！”

霎时，会场上爆发出哄堂大笑。

人们就是这样在那个年代里用玩笑来渲泄自己真实的感情。

虽说邓小平幼年时的家庭还算富裕，可是在 20 世纪的最初 20 个年头里，整个牌坊村的生活都是很困难的。即便在今天，那里连自行车都还不普及，蔬菜和饲料都需人背肩挑，在他们的日常活

计中，每个人都得做体力劳动。但相比较而言，现在的牌坊村已是今非昔比了。

美国作家朱利安·鲍姆在1987年说，虽然广安县的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400元人民币，大大低于全国年人均收入，但是如果同当地1978年的人均收入相比较还是高出很多的，而且成千上万的农业剩余劳力可以在县里开设的企业中谋到收入更高的职业。

1975年，邓小平来到四川省会成都，曾向广安县的代表发出邀请，请他们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来会见他。

“邓小平同志当时说，如果广安的农业能够达到亩产千斤粮时，他是要回去看看的。”广安县的县长这样追忆说。

事实上，广安县的生产在1983年就已达到上述水平，并立即向四川省政府上报，可是邓小平同志仍认为还没有必要回家乡一次，直到1986年春节期期间，邓小平因视察工作来到成都时，才和他夫人向家乡发了一封贺年电报。

邓小平在家乡的至亲，现在只剩下他的舅父淡以兴和舅母淡杨氏了。淡氏夫妇与担任村干部的儿子淡文全同住在邓小平旧居中。据说，1982年，邓小平夫人卓琳代表丈夫亲笔修书给二位老人，一者问安，二者嘱其不可给当地政府添麻烦。出于这种缘故，二位老人依靠邓小平每月寄回的几十元钱和淡老先生微薄的薪俸，过着简朴的生活。1984年，淡老先生担任了县政协委员，与早些时候担任县政协副主席的杨森先生的公子杨汉翔和担任县政协常委的谷正纲先生的外甥女桂秀明，共同参与政事，在乡里传为美谈。

近年来，许多游人到牌坊村参观，目睹邓小平旧居如此简陋，心头总是不免泛起一股歉疚滋味。不过，著名老作家马识途先生在旧居门前秉笔直书一副楹联，似乎使人们的心境多少得到些慰藉。

上联——“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下联——“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山秀水，兴工扶

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邓小平，不愧为广安人民的骄傲！广安人民说，虽然这里经济落后，可是千余年来出了不少名士重臣。他们可以一口气历述几十个包括位居元、明、清三代庙堂大官的名字。